

当代教育科学译丛

比较教育：目的与方法

〔澳〕 菲利浦·E·琼斯著

王晓明等译

03

出版社

当代教育科学译丛

比较教育:目的与方法

〔澳〕 菲利普·E·琼斯 著

王小明 李立勇 杨 骏 译

春 秋 出 版 社

比较教育：目的与方法

(澳) 菲利普·E·琼斯 著
王晓明 李立勇 杨 骏 译

出版发行：春秋出版社

(北京 1929 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燕郊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 6 印张 126 千字

198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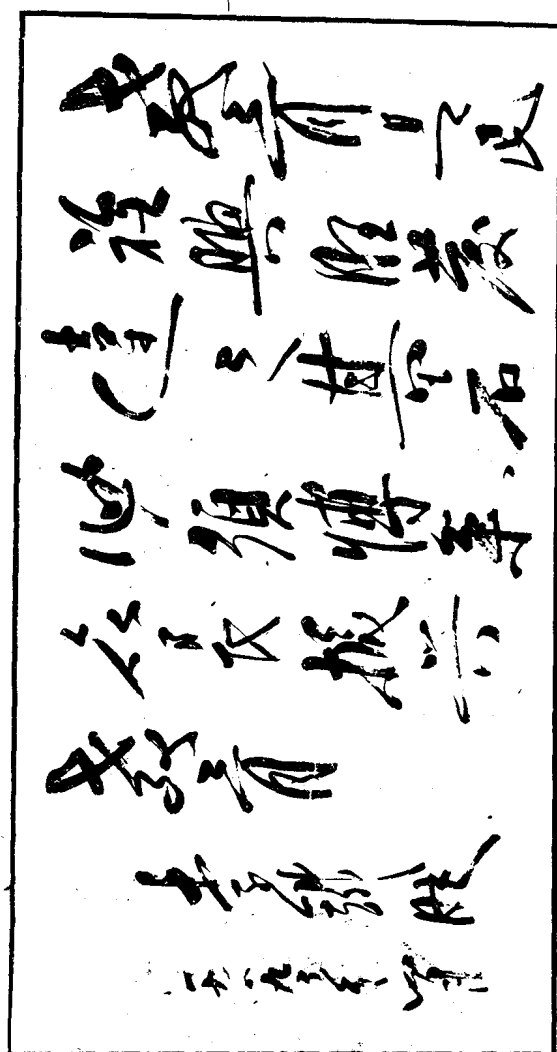
ISBN 7-5069-0169-2 / G · 73

定 价：2.50 元

《当代教育科学译丛》

编 委 会

- 主编** 韩书田 (原《教育研究》主编)
- 编委** 金世柏 (中央教育科研所研究员)
- 于仁兰 (常务, 中央教育科研所副研究员)
- 巴塔尔仑 (新华社副译审)
- 张志远 (中央教育科研所助理研究员)
- 韩 云 (中央教育科研所助理研究员)
- 于 禾 (中央教育科研所助理研究员)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

为《当代教育科学译丛》《智能开发译丛》题词

出版说明

为了给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提供借鉴，我们春秋出版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属)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等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精诚合作，组织翻译了十几个发达国家能够反映当代世界教育科研先进水平的一批很有价值的图书，分别编入《当代教育科学译丛》(36本)和《智能开发译丛》(14本)，共计800多万字。

这两套译丛在翻译、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央领导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的大力关怀与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为这两套译丛的出版亲笔题词：“教育是民族兴旺发达之基石，必须博采众长，振兴教育。”

这样两套大型译丛同时出版发行，在国内可以说是少见的，其难度也是很大的。在编辑、出版、发行过程中，除了得到编委会、译者、印刷厂的通力合作外，还得到了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海南琼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大力协助。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和人力所限，这两套译丛在出版过程中难免有一些差错和不尽人意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春秋出版社

1989年5月

《当代教育科学译丛》

编辑说明

(一)

现代社会教育系统的有效运行和功能发挥，涉及到许多条件和因素。其中，在物质(资金、设备等)条件基本具备的基础上，教育工作者的素质(除了身体健康状况，主要指专业能力、知识结构、社会政治信念、心理品质、价值标准、伦理道德观念、思维水平和个性特点等属于内化的精神状态)和行为(主要指决策、管理和教学等外在的实践活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何提高素质和优化行为是十分重要的，当今世界重视教育的国家对此都给予极大关注。

当前我国的教育工作者，虽然绝大部分积极努力，具有不同程度的献身精神，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素质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行为方面较多的限于经验型和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这些方面都亟需提高。素质提高和行为优化，有许多途径和方法。实践锻炼和经验总结无疑是重要的，但仅限于此远远不够。因为这种途径和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使其获得新知和开拓进取显得迂回曲折，十分缓慢，而且往往跳不出传统框架。为此，需要科学，需要理论，需要借鉴。这就要求我国的教育工作者加强学习。其中，认真地、比较系统地读一些书是十分必要的。《当代教育科学译丛》正是为适应教育工作者的

这种需要而编辑出版的。为我国教育工作者有计划地提供一批国外优秀和比较优秀的读物，以此为他们服务，是我们的衷心愿望，也是本“译丛”编辑出版的宗旨。

(二)

近些年来，我国出版界陆续出版过一些有价值的教育译著，但象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当代教育科学译丛》这样比较全面系统的丛书尚不多见。本“译丛”绝大部分是当代世界最新和较新的著作，比较能够反映新的科学成果。这些新成果自然是在继承、总结和批判过去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因而从中也可大体窥见过去成果的面貌和发展脉络。此外，新成果一般同现实生活联系更加紧密，也更加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需要，本“译丛”选取的大部分是80年代出版和修订再版的著作。考虑到教育科学的各个分支，有少数门类目前国内一时难以找到80年代的国外原著，故选用了70年代的版本，但内容也相当新颖。我们把本“译丛”的这一特点称做“新颖性”。

“译丛”编辑出版所依据的另两个标准，即科学性和实用性。科学性是指：在态度上实事求是和公正；在方法上合乎逻辑（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在内容上材料翔实、论证有力，对事物及其规律尽可能准确表述和求索探讨，并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断。对实用性，我们理解的比较宽泛，不仅应当包括方法、技术和工具的借鉴应用，而且更应当包括实用知识的获得和获得实用知识的能力。

以上就是本“译丛”内容方面的基本特点，即新颖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新选著作在表达形式方

面的通俗性。上述四点，是我们尽量要求的。这里说“尽量”，是因为限于种种条件，也限于我们的水平，是否能够尽如人意，不敢绝对肯定。但可以肯定地说，包括近百位作者的几十部著作，不仅风格各异，而且从以上标准看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究竟如何，请读者自作判断吧。

(三)

教育系统十分复杂，其领域也非常广泛。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更新加速，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教育在发展中也出现了大量新情况和新问题。教育研究涉及到许多方面和学科，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世界各国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研究教育的著作浩如烟海，已编辑出版的系列丛书也如山林层出(本“译丛”的许多著作就是从多套丛书中选出的)。在这种情况下，这套“译丛”要想包罗万象是不可能的，但如果选择面过窄，既难以适应各方面读者的需要，又难以顾及教育领域各方面的问题。为此，我们采取的原则是，在精选的基础上，尽量照顾各分支学科。这样，广大读者既可以从中“各取所需”，又可以比较全面地获得多方面的知识信息。当然，这对研究某一特定学科的专家学者来说，就显得不足了。好在我们的着眼点主要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批优秀读物，不是为某一专门研究领域提供齐全的文献资料。即使如此，专门研究者也可以参考。

根据以上考虑，正如读者现在所看到的，本“译丛”内容比较广，包括：教育基础理论、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学、教学论和教学法、课程论和课程研究、教育技术学、教育经

济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德育和美育、计算机教育、教育手段和工具、教育评价、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学校保健学、闲暇教育、社会教育学、家庭教育、幼儿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尽管如此，但仍有一些重要分支学科未能单独列入，如教育史学等。不过这方面的内容在本“译丛”的许多著作中都有涉及。

(四)

本“译丛”的原作者分属 10 多个国家。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描述的一些现象，揭示的一些规律，固然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但他们毕竟是外国人，所利用的一些材料和针对的一些情况，又有不少具有国别和社会特色，和我国不完全相同。因此，读者在阅读学习时，要注意结合我国实际；即使是对一些方法和技术，也不宜盲目照搬。

本“译丛”内容丰富，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受到很多启发。对此，读者自会有所感受，不必多言。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在阅读本丛书的著作时，处处使人欣慰地感到，众多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所表露的对人的特别关注，即对人的价值、需求、利益、个性和爱好等的关注，尤其是对人的成长和完善的关注。对人的关注以及与此相连的对人的热爱。可以说是本“译丛”在情感方面潜在的一大特点。如果说关注和热爱人不是教育和教育科学所独有的话。至少可以说教育和教育科学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突出。文学艺术主要关注的是人的现实存在，而教育除了关注人的现实存在，更着眼于对人的发展和未来的关注。这是由教育以培养人为目的和对象的本质特点决定的。作为教育科学，不仅关

050200

注受教育者，也同样关注教育者。因为关注教育者是关注受教育者不可缺少的环节和重要方面。关注和热爱人，是教育和教育科学的生命。我们怀着热切的心情，连同本“译丛”一起，谨以此言奉献给可敬的读者——教育工作者及其他一切关心教育的人们。

本“译丛”能够同读者见面，有赖于一百多位译者和对编辑出版发行作出贡献的单位和同志的辛勤劳动，在此谨致衷心谢意！译者中有许多是中青年，虽然他们积极热情，但翻译经验可能不足，加上时间仓促，译文中难免有误译与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当代教育科学译丛》编委会

1989年3月

序 言

我们之中那些在比较教育领域里工作多年的人们将会欢迎这本书的问世。因为这本书不仅涉及了象康德尔和汉斯这样的比较教育研究的先驱者，象劳韦里斯、马林森和莫尔曼这样卓有成绩的后继者，而且涉及了更年轻的一代——贝雷迪、金和我本人的工作。我们各自有不同的观点，然而这对于新问题的研究是有益的，能够促进研究的深入。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老师那儿获益非浅，又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比较教育研究中的问题，以确保广为接受的目标的实现。菲利普·琼斯先生以其特有的理解力，对这个领域中的文献进行阐述，并指出存在着象研究方法这样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共同的研究课题。

比较教育的目标之一是理论研究。这种研究可以改进我们对教育的理解，特别是对我们各自国家教育问题的理解。比较教育还有一个实践的目标，可以帮助管理者们对学校进行有效的改革。有时，这两项任务被看作是对立的。我认为并非如此。工程师需要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社会改革者们同样需要改革的理论作为改革的依据。

作为一门理论化概括的社会科学，比较教育是由那些能促进我们理解教育过程的理论、假设、模型和定理所构成的。比较教育学家对他的研究课题感兴趣的目的在于要建立起一个可检验假设的模式，并开发出能对综合数据进行分

类，对功能联系进行检验的理论模型。而理论科学工作者的兴趣则在于通过经验检验假设。逐渐在比较教育中形成的理论知识体系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这门学科应当作为一门有其独特风格的学科与教育社会学和教育经济学并列。

当然，这位社会工程师并不想检验他的假设。他需要的是找到可以使学校的管理和改革工作取得进展的规律。如果比较教育可以帮助改革者的话，那么它必须开发出一种社会技术，以便为改革实践提供现实的理论基础。然而，目前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阶段，还不能提供检验过的假设作为政策的基础。但是，比较教育学家们表现出的对于改革的谨慎态度，意味着他们架起的桥梁不会倒塌，他们的飞机也不会失事。只是现在教育计划尚处于初创时期，因此比较教育还没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过去，比较教育依赖于对历史学家工作的大量的解释分析。现在则使用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资料和技术，并取得了成功。心理测验学家进入比较教育领域却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失误。毫无疑问，需要有更多的建立在现代哲学的政治科学方法和技术基础之上的研究。比较教育学家向来谦虚地认为他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跨学科的，而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的研究资料和方法是独特的，它既要从其它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吸取营养，同时又并不属于其它的社会科学。

琼斯先生的书里充分地阐述了比较教育研究对于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他引导澳大利亚的学生们去发现他们自身的问题，并指出怎样从比较的观点来考虑这些问题。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对每一位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及其教科书都进行了讨论，因此，我们在这本书里将会比在许多其它教科书中更

完整地看到目前比较教育所处的地位。

这本以谦虚、严谨的态度完成的著作并不是争论性的。它涉及了一些著名的最新领域。我欢迎此书对比较教育探究方法进行的公正而具批判精神的分析和解释。这样的一本书肯定会进一步引起有益而活跃的讨论。这将有助于理解作者所做的巨大贡献。

布赖恩·霍姆斯

(伦敦大学比较教育学高级讲师)

作者序

对比较教育的兴趣和积极性在迅速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当今紧迫的、大规模的教育问题造成的；又是政府对于作为合法的国家事务组成部分的教育机构所承担的义务不断增强的反映；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各界人士努力的结果。这些人们或者对于其它国家的教育制度感兴趣（当然并不纯粹是出于好奇），或者对怎样使他国的经验在规划本国教育改革之中起作用感兴趣。从历史角度来说，比较教育学家们已经花了很短的时间就收集到了有关整个世界教育活动的大量的给人深刻印象的事实，虽然这些事实并不完全。令人高兴的是，各位比较教育学家所收集的材料和所着手解决的问题是极为一致的。另一方面，在许多比较教育学家中有关其研究的目的上却呈现出某些不一致，而在为达到目标所选用的适宜的方法上就更少一致性了。

尽管有关研究目的和方法论上的不一致可能具有干扰作用，或者甚至是灾难性的，但是这种分歧也被认为是具有活力和发展的标志。方法问题在比较教育发展的早期就受到关注，但是从未象1960年以来那样大张旗鼓。由乔治·贝雷迪教授和布赖恩·霍姆斯博士在几乎同一时期（1946——1965年）发表的见解，不仅在方法上两者之间有极大的差异，而且与康德尔及其追随者的思想也相去甚远。康德尔的思想在前几十年中曾经很流行，几乎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继

贝雷迪——霍姆斯的提议之后，爱德蒙·金博士开诚布公地表达了他特别对霍姆斯在比较教育界所一直占据的地位的非议。然而，他也同样强调比较研究对于在实际事务中做出正确决策的潜在作用，它将对必要的教育改革起促进作用。这种观点的对立，正如过去所出现的那样，确实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比较教育方法论和目的的兴趣。同时，也唤起人们对过去和近期，比较教育领域中其它学者的思想的兴趣。这种对立甚至也使人们看到，缺乏一种专门概括比较教育学家有关研究目的和方法的思想发展的普通的教科书。而本书正是试图适应这种需要。

本书写作的另一动机是作者认为教育领域中需要取得比目前更多的成果。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遗憾的是其中许多问题，无论从管理还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极为复杂性和顽固性表明所有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都需要进行一番探索。因此，如果比较方法论上的发展，特别是那些致力于促进教育改革的方法的发展，被证明是有用之时，那么，这些方法就应当得到验证，并要使之广为知晓。上述方法论方面的发展是十分复杂的，并肯定会引起学术界的热心关注。尽管如此，这些方法的潜在作用在大学之外，即使不多，也同样是令人振奋和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写作时，我更多地考虑教育管理者的需要，因为他必须抓住教育中的问题，并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在官僚主义的包围下，教育管理者的生活中存在着不小的压力和阻力。他需要在计划、决策和实施中应用比较的方法，正如他使用从教育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中吸取的定性、定量方法一样。但是观察结果表明由教育管理者进行的教育比较并不总

是有效而可靠的；当谨慎地并尽可能科学地运用比较时，比较方法论“发展界限”的正确评价才能提供有益的启示，而最重要的是，教育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构成民主社会的一系列复杂因素。当今的教育管理者也应当从霍姆斯和金的阐述中，为决策过程找到更多的精神食粮。

似乎无需对又一本关于比较教育的书的出现表示歉意。本书只试图整理已经出版的材料，试图对当前方法论思考上的混乱局面和发展的前景进行概括，而不是对调查中提出的问题给予正面的答复。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从本书所提供的贝雷迪、霍姆斯和金的思想中，我们会看到，最终的回答是这个阶段不可能给予的。

实际上，这本书是很不全面的，这也是探索真理的过程中，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本书是作者在与新南威尔士阿米代尔市新英格兰大学读研究生学位的学生们的共同研究中撰写的。本书还表明比较教育的教学并没有被忽视。由于澳大利亚学生不具有外语这一便利工具，所以本书是作为一本普通的、介绍性的教科书而撰写的。实际上这正是为何最初集中于英语作家，而忽略了某些比较教育学家的原因所在。我也不对澳大利亚人的偏见表示歉意，虽然在本书中是显而易见的。在澳大利亚容易获得的比较材料绝大多数是美国的或英语国家的，因此对于北半球的偏见是会经常出现的，尽管并不象国际上出版的英语材料中那样明显。为弥补这种不平衡，本书倾向于以一个澳大利亚人的观点来探讨比较教育问题（这是恰当的）。我冒昧地指出，那些非澳大利亚的读者将会发现这种偏见不仅是有趣的，而且可以使他们看到教育问题中许多因素的明显的共同性。

在对材料进行纠正、扩展和补充的过程中——当我自